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邓小平与知青上山下乡	余 杰
【劫后反思】	关于文革的思考	吴学民
【文革一页】	林彪对江青的一次发火	李根清
【人物春秋】	“小小老百姓”和大理论家陈伯达	毕唐书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邓小平与知青上山下乡

· 余 杰 ·

一、文革期间再度出山，对于上山下乡持支持态度

在1949年10月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上山下乡一直是持支持态度的，并积极组织实施了大批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的爆发。

1966年文革爆发以后，邓小平成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失去了继续当政的权利和自由。1969年到1973年期间，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直到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才再次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同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全面整顿的期间，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同样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1975年10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青代表在10月20日写的《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在信里他们表示要牢固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新农民等等。

这封信发表的前一天，邓小平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毛泽东也于同日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那时，邓小平对于上山下乡是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邓小平在文革前当政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一直是上山下乡的积极支持者、倡导者、实施者。

1949年10月以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出现了中小学毕业生的比例严重失调，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骤然增加的问题。为此，《人民日报》于1953年12月3日发表了题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首次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务农的设想。这就是日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以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等等，造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大滑坡。1962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对于精简下来的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实际执行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农场能够容纳城市需要就业的学生有限，国家安置一个人需要国家财政支付1000元左右。到1963年5月底，原计划安排到农林场的33.2万人，只完成了15.4万人。

1963年5月浙江省委批转了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这份文件在下达全省各地（市）县委的同时，也上报到中央。嘉兴县的经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把自己的想法先和谭震林副总理进行了交流。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副总理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谭震林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32页）

1964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邓小平对搞好插队问题再一次发表了重要讲话：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邓小平认为，应该集中安置，结合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37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因为它投入少，解决的人口数量大，为城镇青年就业开通了一条新渠道，还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作用。这就是以后形成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1月17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最终形成了中央文件。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在以后的文革期间是上山下乡的一种主要途径。邓小平是这种形式倡导者、支持者、推动者。

一切都是在探索中前行。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邓小平下台了。那些在文革前辈安置的下乡青年们“一些对于工作状况和待遇不满的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也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要求转正、回城和提高待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774页）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比文革前规模更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此时，邓小平还在江西南昌的一家工厂里接受劳动改造。

如何看待文革前期的上山下乡，至今还有分歧。

对于文革前的那段历史，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二、文革后期再次被打倒，文革后再次出山，对于上山下乡的看法有了转变

1976年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一切职务。直到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解决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是在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38页）

开辟新的经济领域，从解决就业角度来解决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在新的时期的新的想法。他没有坚持自己在文革前对于安置城市青年下乡的想法和做法。而是另辟蹊径，在找寻一条事关上千万家庭和青年“重生”的路径。

在1978年，中国进入拨乱反正、转型经济建设。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是一天就可以实现的。尤其是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因为是毛泽东生前发过指示的，很难在短时间里形成一种共识：究竟对不对，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长时期来的传统观念以及害怕惹上“砍旗”罪名，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进展不大。最明显的是当年12月的国务院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纪要》和《规定》。在这些文件里继续肯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强调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场知青转为农垦工人安心边疆、农村建设，插队落户的知青就地落实政策。

这次会议对于国营农场知青的安置办法是导致云南知青在当年10月要求回城写信给邓小平并开始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后，又一次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云南农场发生这场风波的

原因是比较复杂的。而引发的近因则是，他们看到新下发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上规定‘按国家计划分配在农场工作的城镇知识青年都是国家职工’，感到再按病退、困退办法回城的路子被堵死了；又得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企图通过请愿、罢工向上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开放农场知青回城的渠道。”（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50页）

同样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被称为与《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一书姐妹篇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在讲到“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经出现之前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在各地兴起。”（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48页）

一个中央的工作会议，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一项政策，由于没有很好地推敲和研究，造成的结果是一场全体知青奋起的大返城。由云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调查于1979年1月23日写的《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里也讲到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影响：“12月25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处理云南知青请愿问题的3条电话统通知，经过广泛深入传达，部分人开始复工。国务院调查组下去后，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央（1978）74号文件，又有一部分人复工，但是仍有24000人继续坚持罢工。他们说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没有反映和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问题，对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表示不满。丁惠民的复工电报于1月7日、8日传到西双版纳各农场，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只有两个场（景洪、勐养）复了工，有三个场（勐腊、勐满、勐棒）说是复了工，实际上并未复工；有两个场（东风、橄榄坝）仍然坚持罢工；有一个场（黎明）原来没有罢工，1月10日有400人宣布罢工。他们说，丁惠民代表不了他们，不听他的。形势还未稳定。现在，不少青年纷纷卖掉家具、行李、自行离场，返回城市；在场青年，大多数也不出工；勐定农场青年给四川、上海市委发出电报，如不答复返城时间，准备再次绝食，后经劝说未再绝食。知青请愿、罢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棒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5、6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棒、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在云南知青掀起的大返城的浪潮下，这次会议和制定的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意义。这样的结果是会议的参加者们所无法预计的。

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10月31日）前的1978年10月18日，在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知青就贴出《给邓小平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事件逐步升级，以至于发展到了游行、罢工、绝食、卧轨、北上请愿等激烈行动，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极大震动，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期间（10月31日——12月10日），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直接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云南知青情况并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一齐呈送邓小平。此信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他敏锐地洞悉到，知青们闹回城，一方面系知青政策的桎梏。另一方面，当地经济不发达，让绝大多数知青成为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无从发挥其知识的作用，限制了特长的发展，使知青难以在这样的条件下长期工作。（《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2008年5月8日、9日昆明《生活新报》）。

12月初的连续两天时间里，邓小平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以及云南知青的事情讲了话。

12月1日，邓小平专门就云南搞好知青工作和关于西双版纳的开发利用问题说：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好，发展潜力很大，对这一地区要搞一个发展经济的规划，可借鉴外国的经验如用南斯拉夫“佩卡贝”的办法搞。以发展经济作物为主，首先是种橡胶，还可以种甘蔗建糖厂，这样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快。要用新的办法来办，不要对他们干涉太多。国家投资不足，就用贷款，经济发展了，再还国家贷款。把国营农场经济发展起来，带动周围农村社队的各族群众发展。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就是当前的政治。要注意搞好与知识青年相关的各项工作。

12月2日，邓小平在家中约见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等同志，研究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的起草问题。邓小平审阅《中国青年报》写给他的信，并作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批示。（《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2008年5月8日、9日昆明《生活新报》）。

1978年10月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的知青们起来“造反”了，动用一下专政的工具来解决一下不是不可能的。（据记载是有这样的打算的）区区几个知青，在当时领导人的眼中是不足挂齿的。难怪在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关于信的起草者被抓的消息立即传遍了整个农场。“不应压制”！凭着邓小平在当时国内的崇高威望，这样的“最高指示”到了下面谁敢违抗！这能够解释知青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会写信给邓小平的原因，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的原因。也能够解释云南知青最终没有被“镇压”的原因之一。历经半年的抗争及中央和滇、川、沪、京四省市领导上下的沟通、协商后作出的决定，同意知青回城。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

现在回顾总结看来，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由于广大知青为了正义和公平的抗争结果和以赵凡为首的有良知干部体察民情及党中央在时代转型时期需要凝聚人心而实事求是的决策。其中邓小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三、文革结束，邓小平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的历史功绩之一是邓小平强调了处理遗留问题的原则是“有错必纠”，“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起到了历史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由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在召开这次历史性的全会前，12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运筹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上就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这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西双版纳面积大于海南岛，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好，自然资源很丰富，气候也很好，一年四季都可以搞生产。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多给他们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国家不调拨，不交利润。发展生产资金困难，可由国家贷款，还款期长到20年或15年，到时再归还。

邓小平同志对西双版纳农场知青起事的问题是关注的，是了解的，不是一般的重视。这些话对于最终解决云南知青问题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云南农场的知青为了要回家发展到了请愿游行、绝食抗议的严重事件，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12月25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国务院调查组抵达昆明，随即深入到边疆各农场安抚知青。

12月31日，邓小平同志找王震副总理等同志商量，指示说知青问题事关国家安定团结大局，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1979年1月4日，王震副总理、程子华部长在中南海办公室接见了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十位代表，传达了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并说你们提出的重要意见，我负责转达给党中央及小平同志。互动对话进行了1小时40分。

王震送走了云南知青代表，即向华国锋、邓小平汇报了刚才接见云南农场上访知青代表的情况，他们表示同意王震与知青们的谈话。同时，王震还把知青代表写给邓小平的请愿书送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对王震讲，西双版纳这个地方一定要搞好，要搞一个规划，国家可以不收税，可以贷款。邓小平又指出，这个地区还可以用联合企业的办法搞农场。农场不要只注意发展橡胶，还可以发展多种经营，种一些咖啡、可可、胡椒、腰果等，一方面可以供出口换外汇，另外，将来国内旅游业发展了也需要。总之，国家可投入大一点，但是要搞好。

此时，在云南的国务院调查组面对天怨人怒的边疆知青状况，在国务院的首肯下审时度势及时召集滇、川、沪、京四方会议。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云南省委与四川省委及上海、北京市委就如何妥善解决云南知青回原籍的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在云南、四川两省“一放一接”的意向向下提出6条意见报请国务院。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由余秋里主持，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等出席同意上报意见，随后达成了云革发〔1979〕22号文件。（《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启了云南知青回家的大门，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知青的命运。

1月28日，邓小平在启程赴美国进行对中美两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访问前几个小时，仍圈阅了云南知青代表写给王震的信。全国各大报刊登载，达到皆大喜欢的局面。

邓小平在关注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同时，对全国的知青问题也十分关注。1979年2月17日，在我国发起南疆边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当天，他批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通知》强调：为了促进社会政治安定，必须继续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决好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其中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统筹安排问题。

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知青工作。邓小平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他还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知青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指明了方向。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将每年的3亿多元知青工作经费由主要用于安排上山下乡的知青转而逐步用于安置知青返城就业问题。

1979年春节后，云南知青根据云革发22号文件合理合法大规模返城。到1979年5月有61515人返城，占农垦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1979年8月，在全国农场160多万知青基本回城（不包括新疆知青）。

1981年年底，随着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劳动总局继续做剩余知青的工作。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此办理。至此，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

□ 原载《共识网》

~~~~~

## 【劫后反思】

### 关于文革的思考

• 吴学民 •

孙怒涛学长的《良知的拷问》问世以来，得到了很多清华校友的认同，也引起了我的思想共鸣。孙学长又不辞劳苦，担纲主编《清华文革回忆反思文集》，并向我约稿。可是我不像孙学长曾是当年清华文革的风云人物，又对几十年前的许多事情已经淡忘，能为这本文集贡献什么东西呢？苦思良久，我想到，就从一个当年对文革还相当积极的普通一员的角

## 第一部分 我的思想脉络

### 一、入学之初

我1947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父亲是江西一高校的财务科长，母亲是某职工业余学校的数学教师。家里兄弟姐妹七个，我排行老二。虽然父母亲都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但架不住要吃饭的人太多，因此自小生活是很清苦的。我四岁多就由当时是小学教师的母亲带在身边提前上学。从此一级一级读上来，一直到1963年不到十七岁考上了清华大学。

我这个从没有出过家门，个子也没有长到位的男孩，一下子就到了北京，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读书，心中的那份喜悦与激动真是难以言表。当然，也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争取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很关键的。我们上了大学，正在为数年后走上社会打基础。但是这时清华和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并不是一个单纯吸取知识的象牙塔。国际上，中苏决裂，报纸上经常发表对“苏修”的批判文章；国内，执政党内路线斗争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清华领导对于我们的培养目标是“红色工程师”。这当然是起码的要求，近来一些渠道还披露了蒋校长更有培养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抱负。

所以，进校以后一直感到政治空气是很浓的。首先，在图书馆举办的“反右展览”，就给我们绷紧了一根弦。这是要警示我们这些新生们，要好好听党的话，否则你将万劫不复。在学生中有高班学生充当的政治辅导员，还有年级党支部书记，并且积极地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另外还提出要百分之百的学生都是团员的目标。于是班上包括本人在内的几个非团员都被指定了介绍人。我由于年龄一直比同班同学要小，还处处显出不成熟，所以在中学时发展团员的目标也始终没有指向我，我自己也一直对政治上的进步不积极。不过还是在清华“培养”了将近两年后，于1965年加入了团组织。

## 二、风云骤起

大三快要结束的1966年初夏，一场狂风暴雨席卷全国。报纸和广播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主要负责人陆平。我和一些同学还跑到北大去体验了一番。回来后大家议论，报上发表这张大字报，那肯定中央是支持聂元梓的，并且向大家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党委也有可能是“黑帮”的。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从“反右展览”以及平时受到的教育中得到的观念。北大校党委是“黑帮”，那清华呢？于是，一种全新的刺激让我们不可名状地亢奋。清华党委是不是“黑帮”，其实我们又能知道什么？但是，在这场风暴中我们也不能置身度外呀。怀疑一下总是可以的吧？于是我们几个同学贴出了一张“大胆怀疑”的大字报。这算是我参与文革的第一个动作。

当然，校党委为了稳住局面，组织了党员干部进行压制。这一切都只有几天的时间。不久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开进清华，一下子就把校党委给抛出了。以后又发生了怀疑工作组，以及蒯大富等数百名学生被批斗镇压的事件。我虽然没有被当做“蒯派”，但心里一直对工作组的做法不认同，那些天也是感到很压抑。以后又来了个大翻个，工作组撤走了，被认为是执行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路线。这以后，我也一扫心中的雾霾，义无反顾地跟随毛主席，跟随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了。

此后，学校的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领导，大家按各自的观点或倾向加入不同的战斗组，一直到最后形成了俗称为“团派”和“414派”的两大派。我和班上多数同学都倾向于“团派”。现在想起来，一是认为“团派”的主张似乎更“革命”，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更接近；还有就是原来的党员干部大多倾向于“414”，我们“老百姓”自然不要与他们一派。



因此，我就成了一名“铁杆老团”了。老团组织的许多活动我都积极地参与，以至于在武斗以后还不像绝大多数同学那样选择离开，而是一直到了68年7月份才离开学校回家。在此期间，我也曾披盔甲执长矛。幸好不曾伤人及受伤。最近，我几位中学同学知道我曾参与了清华武斗，都感到不可思议。我是这么回答的：“我当时确实认为我们遇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不想缺席。”

### 三、心如止水

说是十年文革，对我们来说只是两年多一些时间。1968年12月，我们63年级全体同学在“四个面向”的原则下毕业离开学校，各奔前程。我被分配到贵州的一个山沟里的三线工厂。当时那个厂还处于初建阶段，我们这些分配来的大中专生都参加建厂的基建劳动。而厂里的老职工都是由成都老厂迁来，同时也把老厂的文革带过来了。对于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两派都想拉拢以壮大自己这一派。但是经过了母校文革折腾的我们已经提不起兴趣了。

当时我们的情况就是下班以后聚在一起打牌、抽烟、喝酒、聊天。当然也有追求，就是想办法尽快调出这山沟沟。后来开始生产了，除了一些对付工作的业务书外，也没有谁会想到专研一些什么东西。

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对于我的震撼是很大的。虽然我再也不想跟着毛主席把文革进行到底了，但觉得毛的路线、毛的思想还是很正确的，只不过他的很多同事都不理解，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后来把一大批跟随他造反的造反派也整肃下去了，这也可能是出于无奈。但是，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印象中跟毛是最紧的。现在他也反毛了，那毛身边还有几个人呢？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的思想竟会如此高深，以至于那么多人都不理解，都反对？以后，我常常检视毛的路线、毛的思想，总觉得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在闲聊中，听到家在广东的同事讲到香港的情况，和我们内地简直是天壤之别。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香港比社会主义的内地会好这么多？为什么广东一带许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偷渡到香港，去追求他们的幸福生活？我们也探讨过为什么内地发展不起来？但是谁也说不不出其中的原因。

### 四、峰回路转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时，我心中不是悲痛，而是一种茫然。不知他的接班人将会如何动作，是会有所改变，还是真的“按既定方针办”。

以后，国内形势也在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化。在报纸上经常会发表一些抨击文革的文章以及“伤痕文学”。我也对自己曾积极参与的文革开始进行了反思。

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同时也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把这看作是离开山沟的唯一机会。于是重拾书本，认真备考，最后如愿以偿。我的人生也掀开了新的更有希望的一页。

改革开放，给贫穷落后的中华大地唤起了活力。困扰中国人多年的物资匮乏一下子就彻底改变了面貌。无形中，仿佛给我们当年在贵州山沟中百思而不得其解的纠结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那就是：把自由还给人民，人民就能创造奇迹。

当然，其中的关键人物还是邓小平。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要扭转局势，关键人物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邓在关键的时刻作了正确的事。

历史将会记上他的这一功绩。记得我把考研报告递给厂领导批时，他说：“这谁敢不批？邓老头不答应呀！”

## 五、风雨卅年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个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记得八十年代，我曾多次接到同学单位的外调函，要了解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但都是为了要入党提干。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他们都将在各条战线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可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充溢着激烈的较量。邓小平的做法是“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同时又划出了一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他的做法，对排除干扰，迅速在改革开放上作出成效来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如果长期不争论，那就会让大家都变成只关心发财的经济动物，中国这艘大船也随时都会有走偏的危险。

实际上，三十多年来，中国始终是跌跌撞撞，忽左忽右。又由于政策上出现的许多偏差，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官员贪腐、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只有再来一次文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中国向何处去？是重新举起毛的旗帜，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彻底反思文革，走一条回到当今文明社会之路？或者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要很好回答这个问题，最后都会归结到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因此，对文革的研究，近年来又热起来了。作为曾身处文革漩涡中心的清华学子们自然也不甘寂寞，通过互联网或者境外出版的方式发表了不少回忆和反思的作品。在此，我也试着发表一些自己对有关文革一些问题的思考。

## 第二部分 我的反思

### 一、关于文革的矛头所向

文革的矛头所向，细想起来是有提法上的变化的。

在被视为文革纲领性文件的《5·16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矛头所向是彭真等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的领导，一般又称为：“黑帮分子”。清华校党委抛出时就是如此称呼的。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又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走资派”作为文革的矛头所向。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则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此后就把文革的矛头明白无误地指向“刘邓司令部”。

时至今日，人们对“黑帮分子”这个称呼已经淡忘，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早已被平反。但“走资派”却被一些“左派”们频频提起，那些主张改革的官员常常被冠为“资改派”。“左派”们主张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回到文革所标榜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文革前，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模式。经济上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一统天下。特别是文革后期，还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农村经济死气沉沉，人民生活贫困异常。哪有一点“资本主义”的影子？反而处处突显了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

环视当今中国社会，所谓“资本主义”已然全面“复辟”了。据统计，经济成分中，非公有制经济无论从就业人口还是创造的GDP，已经超过了一半。就从老百姓的生活体验来讲，每天要去的市场、超市，经常要添置的日用品，有多少是国有企业经营或提供的？不过，对于这种“复辟”，大家并没有反感或抵制，反而觉得比起国营商场，这些非公有制的服务行业提供的服务更为周到，服务态度也更好。而现在市面上的诸多生活日用品，虽然也有一些质量问题，但比起以前供应匮乏的年代还是要好多了。有多少人愿意回到那什么东西都要票证的年代呢？应该说，比起当年人们冒死要逃往的香港，现在大陆的市场面貌已经毫不逊色。记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下面流传一句俏皮话：“邓小平上台，会让千百万猪头落地。”这句话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对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态度。

其实，在1966年有什么能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运动初期，我们学生中有一些提出校党委的问题，也纯粹是受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影响。后来工作组一举推翻了校党委，以后就引导大家“斗批改”。按十六条的说法就是：“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大家冥思苦想，能凑出一些什么像样的批判蒋南翔及校党委的材料呢？我记得，当初写的大字报中，连照顾女同学的一些措施都被当做“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加以揭发批判。

现在看来，蒋南翔的教育思想不但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是“党化教育”的问题。他提出要培养提拔“听话、出活”的干部，也即首先要求听党的话，听上级领导的话。这与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自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来，世界上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实际上是历史的潮流。人类社会总的来说是在朝着更人道更文明更符合社会良性发展的方向前进。目前，执政党也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限制词“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其实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引入了大量的“资本主义”因素。

关于“资”、“社”的讨论，直到现在还没有理清。我认为，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已经失败。失败的关键原因是此前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都是极权统治。这样的社会形态，不但束缚了人们的经济活力，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困和匮乏，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活力。当今推动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有哪一项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更不用说，在极权体制下，经常出现的侵犯人权的反人类暴行。但是，它的思想体系中还是有合理的因素应该吸取。比如社会公平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党都十分注意社会公平，关注弱势群体，在这方面甚至比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还要尽心。

因此，文革的所谓“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在大饥荒后采取的一些明智的措施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加以否定，这在当时就是错误的。而从现在各国人民都在逐渐抛弃极权主义的潮流来看，文革更是逆时代潮流的。

## 二、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面提到，1966年10月以后，文革的矛头明确地指向“刘邓司令部”，指控他们实施了一条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摆到全国普通百姓的面前，从而也更加突显了文革是权力斗争的性质。两个司令部，你站在那一边？嗅觉灵敏的青年学生们很容易捕捉到这个信息。

清华大学当年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验地。在毛离开北京的一个多月里，为了领导文化大革命，在京的刘少奇、邓小平按照共产党的惯常作法，向包括清华在内的单位派去了工作组。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参与到清华工作组中来。工作组按照以前，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那一套，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把一些他们看不顺眼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加以批判斗争。

可是当毛一回到北京，局面就戏剧性地发生了逆转。工作组立即被撤出，被打成“反革命”的“蒯派人物”被高调平反。自校党委被推翻后，人们的心理上，又经受了一次巨大的跌宕起伏。此后，被解放被平反的“蒯派”对以毛为首的“司令部”感激涕零，死心塌地跟随毛，跟随中央文革闹革命。

提出批判资反路线后，文革的火药味就愈加重了。它再也不仅仅是局限于文化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从中央到地方整个国家机器陷于瘫痪。各地群众也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或分为不同观点的派别。文革由中央隐秘的权力斗争演化成一场群众之间的恶斗。并且后来许多地方演变成武斗，包括清华也是这样。

现在看来，提出批判资反路线，是毛为了借助群众的力量来达到清除势力强大的政治对手的手段。不能说毛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把他的理念植入到群众心中。可是，所谓发动起来的群众，只能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行事。谁要是有一丝不同于他的想法，更不用说反对他，那就立刻会被整肃，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群众被允许成立政治组织，譬如“红卫兵”，“造反派”等等，但这些与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结社自由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这些组织只能局限在地区范围内，绝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一旦有这种尝试，立即被打成“反动组织”。并且，这些组织在两三年以后因为失去了利用价值，都一个个先后被各种借口镇压下去了。到文革后期，更有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把许多头头都投入监狱。这些措施，比起刘邓工作组对群众的镇压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当时所批判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路线。刘邓执行的那一套，和执政党一直采用的手法并无区别，并且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沿用。

现在有一些人为文革招魂，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文革是发动群众反对党内贪腐分子的运动，对当今克服贪腐现象有借鉴意义。上面已经说明了文革并不是真正允许现代文明社会意义上的结社自由，也不允许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另外，要反贪腐，也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下进行。回顾那两三年，怎是一个“乱”字了得！那时，“公检法”被砸烂，“群众专政”大行其道。往往一个战斗组，就可以把人抓来批斗、关押、殴打，甚至致人死命。这样

做的结果，只能是人人自危。对别人施害者，也很有可能被他人加害，社会陷于一种互相剿灭的疯狂。

### 三、关于“造反派”

“造反派”是文革特有的一种群众派别。它兴起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热潮中。毛泽东抓住刘邓等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错误，给被镇压的群众平反解放，于是这些群众自然成为批判打倒刘邓司令部的骨干力量；与之相对的那一部分群众，则称为“保守派”。

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崛起和覆灭，是文革中一段悲壮的史实。造反派起来造反，首先要得到最高层的“恩准”，是“奉旨造反”。有点像当年的义和团，要“灭洋”，一定要有“扶清”作为前提。造反派也一定要按“最高指示”办事，“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但是，一旦目的已达到，造反派完成了历史使命，就“轮到他们犯错误了”。

应该说，造反派起来造反，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说是“痞子运动”，是沉渣泛起。他们造反，很多都具有合理性。文革前的十七年，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积累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矛盾也一直没有化解的机会和渠道。因此，一旦毛要利用群众的力量时，这些矛盾就像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一样释放出来。参加造反派的人各有各的原因，当然共同的原因是心有不满。

虽然学生比较单纯，但也形成了强大的造反派。学生参加造反派，可能不像社会上的造反派有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但也有一定的原因。我想，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原因就是对文革前的那一套政治思想控制的不满。中国的教育方针明确表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学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生常常被评估他们的政治觉悟。觉悟高者，便入党入团；党团员也对非党非团者进行帮助教育。但无形中给人就有一种在组织者高人一等的感觉。在同学中也往往会造成一些隔阂。但文革初毛泽东不按老规矩出牌的做法却让一直紧跟组织的那一部分同学转不过弯来。而另一部分同学却觉得很解气，原来你们也有“觉悟”不高的时候！这一部分同学就很容易加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

在法制荡然无存的年代，一群乌合之众起来行事，想不犯错也难。造反派如今背负了文革的大部分罪责。当然，冤有头债有主，谁犯了什么事，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正如胡耀邦对蒯大富处理的意见说的：“我当时不赞成把他们捧的那么高，现在也不同意把他们整的那么狠。”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革的罪责由“四人帮”和所谓“三种人”来分担，而始作俑者却只是以“错误”来加以论定。官方版的“彻底否定文革”，就是把已经在文革后期打下去了的造反派冠以“三种人”的帽子，再“踏上一只脚”，彻底打入十八层地狱，当初挨整的“走资派”则如同“还乡团”一样彻底翻身了。文革当然要彻底否定。但是不能只是停留在让“走资派”翻身上，而是要彻底反思深层次的问题。要看到，造反派起来造反实际上集中体现了社会许多积累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靠镇压，也不能靠一味“扼杀在萌芽状态”的“维稳”，而应该首先让矛盾有个发表宣泄的渠道，还应该有个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

遗憾的是，彻底否定文革，并没有带来彻底的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有冤无处申的民众的忍耐力仿佛已经到了极限。近年来极端事件频发，且愈演愈烈，真有点揭竿而起的味道，让当局疲于应付，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

力。前一届领导人提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但事与愿违，“和谐”二字似乎只是停留在动车组的车头上。

#### 四、关于武斗

文革其实不只是“文斗”，而是一开始就伴随着“武斗”。“文化革命”演变成了“武化革命”。

武斗开端于1966年8月。受到毛支持的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在北京对所谓“黑帮分子”、“走资派”、“黑五类分子”等“牛鬼蛇神”大施拳脚，有许多人被打致死。

造反派兴起后，在对“走资派”的批斗会上也常常是“触及皮肉”。

一直到各地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派后，似乎只有武斗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许多地方除了长矛大刀外，更抢夺军用物资，动用热兵器，俨然一场全面内战。许多人在武斗中受伤乃至丧生。

在和平时代，理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但是却出现如此乱局，真是匪夷所思，究竟为何？

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有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而和国民党斗争的胜利靠的是什  
么？不就是靠武装斗争吗？这段话发表的时间，也正是清华两大派斗争正酣之时。两派都将对方视为国民党。接下来几个月的清华武斗也就顺理成章地展开了。我对这段话印象很深。我想，凡是参与了清华武斗的同学可能对这段话都不会陌生。

在一座天子脚下的中国最高学府，昔日的青年学子，却舞刀弄枪，欲用武力让对方在校园无立足之地。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何等的荒唐，不可思议。

这场百日武斗，让不少同学深受其害，有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同学则由于自己的愚蠢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处。武斗中，不管是伤人者还是被伤者，其实都是受害者。伤人者在事后承担刑事责任固然应该，但是事情决不能到此为止。

大家都是受害者，那是因为伤人者并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他们是在一个“崇高”的目的之下武装起来的。他们是受了蛊惑出这一套歪理邪说的人的毒害，才会把自己的仅仅不同政治观点的同学校友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个“崇高”的目的，本来就是大有疑问的。即使是政治目的真是崇高，也不能采用把异议者从肉体上消灭的方法来达到。这只能说明这个目的本身是邪恶的。

上个世纪欧洲出现的德国纳粹，他们的理论是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而犹太人则是渣滓。因此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变成了杀人恶魔。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他们都是犯了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

现在人们都会对上述两件反人类暴行加以谴责，但是并不说明类似的情景再也不会重演。去年九月份，由于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中国国内的反日游行中就出现了严重的暴力行为。有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他人大打出手；更多的是把攻击的矛头对向开日系汽车的同胞。他们视自己是“爱国者”，在“爱国主义”这个崇高的口号下，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件事情说明，文革并没有走远，文革思维还常常在许多人头脑里作祟。长期以来，人们都接受了一种把社会上另一部分人视为异类的做法。他们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但是却没有政治地位，随时都可以被羞辱、被镇压。而随着年复一年不断出现的政治运动，又会划出新的一批异类。这就是所谓“阶级斗争论”。可以说，阶级斗争论的后果就是人为的把社会撕裂，激化社会矛盾。

1949年以来，原先的地主、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已经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因此，所谓的“阶级敌人”都是纯政治意义上的，有许多甚至只是思想上的。而对待不同的政见，不同的思想却采用暴力斗争的手段，这是对人权和人性的粗暴侵犯，是和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

改革开放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被抛弃了；昔日的异类，也基本上得到了平反改正；“反革命罪”也从刑法中去除。这些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在对待不同政见者的处理上还是与文明社会相比差距很大。持不同政见者虽然一般不会有性命之忧，但常常会被以其他刑事罪名关进监狱。更有许多人因发表和官方不同调的言论，而被劳教被整肃。在互联网上，更是充斥着一股戾气，经常有人会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措辞凶狠，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个社会要真正达到和谐，一定要建立全体成员和平共处的规则，那就是宪法和法律。宪法保障了人人都享有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各项自由，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可在法律之外随意限制和取消别人的人身自由。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只能通过民主的理性的方法来解决，而绝不可动用武力。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现代文明之路。

### 第三部分 我的希望

文革是一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运动。它几乎波及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它不但影响了每个人的命运，还在思想上文化上给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直到现在还在或多或少左右着当政者和一般平民的思维和处事方式。

应该说，从普通百姓到高位高权重者，对文革都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也要看到，他们对文革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别。普通百姓中有很多在文革中受到伤害，他们呼唤抚平文革的创伤，希望摆脱匮乏、摆脱恐惧、摆脱枷锁；而当权者也对文革中“官不聊生”的状况十分不满，他们希望重塑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立场的不同，造成了对文革的不同解读。几十年来，民间有许多对文革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和作品却只能在境外出版。号称要彻底否定文革的官方话语系统，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反思。其中的奥妙在哪里？

其实也不难理解。文革其实是一场在错误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极端运动。它的极端性，使得许多这种意识形态的追随者都跟不上趟。再加上有不少人甚至成为极端行为的受害者，所以很自然遭到他们的反抗。但是他们的反抗并不想涉及到对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否定，或者说只允许做一些小小的“修正”。因此，要不就是“不争论”，要不就干脆来个“政左经右”。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这些“修正”。应该说，这些修正，大大的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中国的国力也大大的增强，GDP 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崛起”，已成为媒体上常常出现的词汇。

“中国崛起”，并不说明现存的政治制度不需要改革。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广大人民，尤其是亿万农民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由。他们一旦可以自由选择，就迸发了无穷的活力。是他们的辛勤劳动铸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如果把这种经济成果看成是政治体制的优越造成的，那真是十分荒谬。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同时又出现官员腐败、贫富不均等种种社会问题，都无不与政治体制的不相协调有关。

对于文革的反思，许多有识之士都归结到实行宪政上。其实，当权者也不是不知道宪政的重要。文革时，刘少奇曾经举起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薄熙来受审时，也是口口声声要求得到合法公正的对待。可是，在他们还在台上时，却可以不顾法律，轻易就把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或是以“打黑”名义把民营企业家打成“黑社会”，把律师关进监狱，把言论者送去劳教。

宪政就是依照宪法办事。宪法是一个社会最高的行为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它集中体现在保障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以及限制权力的无限扩张。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理性的和谐的，因此宪政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所遵循。如果要抛弃宪政的原则，那么想把中国引向什么地方去？

还百姓经济自由，就立刻出现经济奇迹；如果再还百姓政治、思想、言论的自由，那么可以预见，一个文明、和谐、繁荣的中国一定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我的希望。

〔作者简介：吴学民，1947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63年于南昌七中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光学仪器专业学习。〕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文革一页】

林彪对江青的一次发火

• 李根清 •

江青是个在中国共产党内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物。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初，经林彪同意，军委任命她为军队文化工作顾问，后又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顾问，指示办事组给她送阅有关军队文化工作方面的文件。但渐渐地，林彪与江青及她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拉开了距离，并且渐行渐远。

刚刚进入1967年，与林彪关系不错的陶铸一夜之间被江青、陈伯达点名打倒了。毛泽东虽然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但并没有予以纠正。紧接着又发生“一月革命”、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等高级干部被逼自杀、“二月逆流”、反军乱军等事件，林彪开始对江青及她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重新认识。这期间，他曾几次叫我给他写下关于防“左”防右、反“左”反右的心得笔记。其中的一篇这样写道：“正确路线”应该“大胆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应该“大胆地反对极左思潮”（见由中共中央林彪专案组编发的《林彪散记》）。在全国一片“夺权”、“砸烂”、讨伐“二月逆流”的呼喊声中，提出反对极“左”思潮，无疑是针对江青一伙党内造反派的。这期间，林彪还让林立果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的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林彪这里说的“青威风”，显然是指江青狐假虎威、疯狂整人那一套，表明他不满江青的做法。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林彪与江青在军队文革问题上发生面对面冲突。

军队文革的指导方针是林彪提出，毛泽东批准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是错误的，加上江青一伙推波助澜，所以从1966年冬开始，造反派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抢夺档案等现象也频频发生，部队战备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1967年1月中旬起，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商讨稳定军队的措施。在会上，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竭力反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坚持党委领导，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大民主，不搞大串连，不成立战斗队，始终保持战备状态”的指导方针，而主张军队也和地方一样，全面按十六条办，全面搞大民主。中央文革小组的言论，受到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和与会其他军队干部的强烈抵制。老帅和将领们的这次抗争，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大闹京西宾馆”。

1966年年底，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就指责几位老帅“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煽动炮轰老帅。林彪不同意，说几位老帅“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干工作的，不是不干工作的”。1967年年初，江青、陈伯达又以“保护老帅”为名，点名打倒了“不听话”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并给刘志坚扣上“叛徒”的帽子。林彪同意了。没过几天，江青又诬称肖华是军队文革运动的“绊脚石”，要求撤掉肖华。林彪说，肖华是总政治部主任，拿掉他必须经毛主席批准，把江青顶了回去。陈伯达与江青相互策应，在军委会议上讲话攻击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革清规戒律太多，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把军队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就有气，那里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中央文革擅自召开批判肖华的会议，还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批斗肖华。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但肖华的家还是连夜被抄，档案被抢。肖华从后门逃到叶剑英家里才免遭揪斗。

一天上午，叶剑英照例到毛家湾向林彪汇报军委会议情况。当叶剑英说到陈伯达污蔑军队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鼓动打倒肖华及肖华家被抄这些情况时，林彪吼道：“让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当即命令秘书打电话叫江青立即到毛家湾来见他。

江青于下午3点多到毛家湾。林彪一见江青，不容江开口就连声责问道：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你们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一见三座门就有气，这是为什么？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太放肆了！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军队是修正主义，我这个国防部长是什么？我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

量，就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去见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江青说：军队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回答：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林彪更加火了，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掀翻，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

盛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备车”，并冲着江青说：我们两个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据秘书张云生回忆，这时他正在叶群办公室，向叶群报告当天急需处理的中央传阅文件。他听见门外走廊里传来林彪大声喊叫：“叶群！叶群！叶群！”

张云生急忙放下文件，跑向走廊，林彪还在那里喊“叶群！”他看到，“林彪气得脸上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两道目光也凶得吓人”。张云生说：“我到毛家湾后还从未见过、也没听说过林彪发这样大的脾气。”

“首长，怎么了”？张云生走上前去问。

林彪火气很大：“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

这时张云生听到从林彪的东客厅里传出江青的声音：“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张云生说，与林彪相比，江青的语气要和缓一些。

在叶群的苦苦哀求下，林彪才没有拉上江青去见毛泽东（见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131—132页）。

江青走了。林彪愤愤地说了一句：“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

这件事后，林彪严令叶群，不准去钓鱼台。江青也说，不愿再看军队的文件，也不稀罕顾问的头衔。

叶群哪肯听林彪的劝诫？她怕得罪了江青对林彪没好处，偷偷跑到江青那里去说好话。当晚回到家里却把我找去，把陈伯达在军委会议上攻击肖华的讲话，把江青对军队开展文革运动的意见，把林彪与江青见面的情况，详细细细地搞了一份追记材料，锁进她的小保险柜里——叶群白天对江青说好话，夜晚照样整江青的文字材料。

紧接着，1967年2月14日，“三老四帅”（李先念、谭震林、李富春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第一次“大闹怀仁堂”。当陈伯达提到江青对军委《八条命令》不满时，叶剑英第一个向陈伯达开炮，斥责中央文革小组妄图搞乱军队，这与叶帅已经了解林彪的态度不能说没有关系。

林彪性格内敛，处事沉稳，素以“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自律，喜怒哀乐很少挂在脸上。江青则是个骄横跋扈、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谁得罪了她，谁就要倒霉。林彪从心底讨厌江青，但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林彪敢于对她大发脾气，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林彪是决不允许江青一伙插手军队事务，破坏军队稳定的。

与林彪暴跳如雷的情状相比，江青在被林彪训斥的时候，乖乖地听着，无还手之力。因为林彪选择的时间、地点、事由、火候均恰到好处，骂完即令人“把江青赶走”，不容辩白，所以江青只得哑巴吃黄连。

后来发生“二月逆流”，江青一伙借机对几位老帅下了狠手，却没敢触动林彪。不过从此，林彪与江青之间，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枪杆子”与“笔杆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互相虚以委蛇，面和心不合。文武双方围绕乱军与稳军、倒周（恩来）与保周、支“左”与支“右”、乱与治等方面的斗争，或明或暗、或激烈或缓和地持续，一直绵延不断。江青有恃无恐，经常挑起事端。老帅们投鼠忌器，难免忍耐避让。但军队始终是国家稳定的力量，制乱的力量，健康的力量。从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到军委办事组时期，都对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严密设防，直至林彪摔死，江青一伙也未能抓到军权。这是文革期间军队没有乱起来，毛泽东能够依靠军队收拾全国乱局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唐山市开平区退休干部，曾任林彪办公室机要员）

□ 原载《炎黄春秋》2016年第2期

~~~~~

## 【人物春秋】

### “小小老百姓”和大理论家陈伯达

• 毕唐书 •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中央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于陈伯达其人，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文革亲历者和观光者，最初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只要讲话，总要把“我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挂在嘴上。当时听了总觉得怪怪的，再联系到他讲话时那种不清不楚嘟嘟囔囔的声调，让人感到此人似乎有些卑微和窝囊，不由地会想到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切尔维亚科夫。这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大理论家的身份太不相称，和他的文章的气势反差太大了！或许他是想以此显示自己亲民，显示无产阶级革命化，但这也未免有些做作，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虚伪。

—

但陈伯达身上确实有些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的味道，老实谨慎得有些卑微，胆小怕事得有些窝囊，特别是在毛伟人和女皇江青面前。比如，他以“跟准”毛泽东为“准则”。他最关心的是摸毛泽东的动态，以步步紧跟。毛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都很注意。

他总是在揣摩毛的心思，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围着毛泽东转。作为秘书，他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在定稿之后，他往往要把自己写的手稿撕掉，以免将来万一被毛泽东看见，惹事生非。因为有些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文章，初稿常常是由陈完成的。文革期间，由于陶铸被打倒一事，毛泽东突然向陈大发脾气：“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和我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毛还说，要陈和江青做检讨。本来，打倒陶铸，完全是毛的旨意，陈和江青只是奉行行事，毛现在就此事批陈，无非是想让陈背黑锅，自己做好人而已。谁知陈伯达听了，很紧张，想自杀，而且还为自己找到了根据：“我查了书，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王力劝他还是写检讨为好，而此时的大理论家陈伯达竟然紧张到连检讨也写不了，最后只好由他口授，王力捉刀。在江青面前，陈伯达也是一个受气包。江青当面骂他是“刘盆子”（讽刺他这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傀儡），嘲笑他是“黎元洪”。文革中，有一天陈中南海住处的墙壁上发现了几个脚印，结果惊动了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把现场拍了照。消息随后传到了江青那里。江一听，大发脾气：“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滚出中南海去！”结果，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地听从他的那位常务副组长的调遣，“滚”出了中南海。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地点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附近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碰见江青。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厕所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从此，包括陈伯达在内，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陈伯达不但在毛、江处受气，就是文革小组的其他人，也都不把他放在眼里。顾问康生骂他是“乌龙院院长”，关峰、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等也都听命于江青，不时向其发难。

但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又不全是作秀。他也确实不把自己当“首长”，不搞特权，生活俭朴，也不摆臭架子。他不让秘书和服务人员喊他“首长”，而让他们称其为“陈教员”。他的儿子陈晓农回忆说：“别人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总是回答：‘陈教员’。这不仅是父亲让我这样回答，当时大人们也经常这样称呼他，所以我当时真的以为他就叫‘陈教员’。”他到地方做调查，也不搞特殊。1991年初，一位已离休的老干部对陈晓农谈起陈伯达，说：“1958年底你父亲来福建时，和我同到一个生产队蹲点，天天吃地瓜，后来工作队的人都吃不消了，犯胃酸。我还好，我是当地人，但后来也觉得顶不住了，可你父亲仍是一声不吭，天天吃地瓜。你父亲通过与群众同吃同住，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严肃批评了脱离群众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我和叶飞说起此事，他说了一句：‘这样和群众同吃，很对，但是，也很难。’”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作为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竟然在1965年高中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主动到内蒙下乡当了老百姓。文革开始后，内蒙很乱，因为父亲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老有人想拿他做文章，所以无法在内蒙继续待下去，最后由陈伯达出面，通过当时河北省的负责人李雪峰，调到石家庄市的一家工厂当工人。陈晓农记得，父亲带他去见李雪峰时，曾当着自己的面说：“绝对不能让他当干部。让他当工人，从学徒学起。”陈晓农果然化名当了学徒工，直到1970年10月满师后，才转为正式工人。而此时，陈伯达已经被隔离审查。这些，恐怕是只会做秀的人做不出来的。

在出身平民家庭的子女看来，文革中陈伯达做的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批判“血统论”。“血统论”风行于文革初期。1966年7月底，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一副名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此联一出，立即引起“轰动效应”，特别是受到高干、军干子女的狂热支持，伴随而来的是“红色恐怖”。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幅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消息很快传进“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耳朵，陈当即作出反应，于对联贴出的第四天凌晨，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对对联持相反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明确表示，这幅对联“不全面”。他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所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的翻版，并把对联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关于“血统论”风行的政治背景，陈伯达后来的说法是这样的：中央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过12天的光景，有一个大学的“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了同中央16条决定相对抗的一篇讲话，印发得很广。有人对中央的决定没有任何兴趣，但是，对那一篇同中央决定相对抗的讲话却视为至宝，为之翻印、广播，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位所谓高干子女直截了当地宣称，那个讲话“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陈伯达提到的“那个讲话”，就是文革初期为所谓“红五类”，特别是高干、军干子女疯狂吹捧的《谭力夫讲话》。谭力夫何许人也？他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其父为当时已去世的前副检察长谭正文。《谭力夫讲话》集中宣扬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他说：“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的讲话也道出了一些高干子女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直觉：“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是严厉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是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更是把这个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并将其与“反动”联系起来：“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利用一部分年青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什么‘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

陈伯达的讲话，等于让非“红五类”，特别是“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听到了特赦令，使之从长期不得喘息的压力下，突然得到了心理解放。文革以来第一次，他们可以“合法”地，理直气壮地对血统论说“不”。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许多血统论的鼓吹者自己也很快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此，血统论声名狼藉，再也找不到市场。即使近半个世纪之后，它的当代变种——“红二代”们虽然试图重演当年“联动”的故事，但也难以得到社会的回应，最终也只能再一次成为历史的笑柄。吊诡的是，就在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讲话发表不久，另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力作《出身论》问世，但其命运却绝然相反。《出身论》的作者是北京24中学的学生遇罗克，文章一问世，结果竟然受到公安部门追查。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遇罗克随之被以“恶毒攻击”的罪名逮捕入狱，并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于1970年遭处决。直到1980年，该案才得以平反。但不管怎么说，陈当年对血统论的批判，还是有勇气的，也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理应得到历史的肯定和尊重。

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反映了他的懦弱谨慎性格掩盖下的另一面，即书生的倔强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一面。当时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无人敢说“不”字，即使异议者一般也只是说这个对联“讲阶级路线过了头”、“过分了”、“过左了”，没有人把它和“反动”一词相联系。对“红五类”、“黑五类”等说法也是这样。有些领导人对“黑五类”的说法表示过质疑，但是没有反对“红五类”的说法。而陈伯达却独树一帜地将其称之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全然不顾这样做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众怒”，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容易的。

纵观陈伯达的政治人生，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轨迹，即：什么时候当他能够从做人的良知出发，能够“以人民利益为重”独立思考时，往往就能够提出正确的见解，作出正确的选择；反之，当他愚忠盲从，步步紧跟伟大领袖不动摇时，往往就会出问题。前者如，由他提出，并写入中共八大闭幕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然，不久，毛泽东便对此提出异议，八大路线从此被冷冻。另如，1959年的“严重右倾”，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九大时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企图扭转文革路线，等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提出的“电子中心论”和被批为对抗九大路线的“唯生产力论”。

1965年，文革已经进入酝酿阶段，领袖的替身江青已到了上海，正在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引爆文革的重型炮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匪夷所思的是，左派首席大理论家陈伯达对此竟然毫不知晓，此时的他正在北京、天津参观工厂、科研机构，酝酿提出新理论——发展国民经济，搞四个现代化，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这个被称为“电子中心论”的新理论，是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科学院发表的讲话中提出的：

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发展电子技术作为国家方案”；东德提出，电子元件工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要将电子工业“作为主导工业部门之一来发展”。日本人的企图是什么？东德的提法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抓电子化能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抓电子学、电子技术、电子工业，在各方面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我们要“赶上”和“超过”，就不能沿着旧的路子，只从后面按部就班地追，这永远也赶不上。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要敢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最新的成果，打破老常规，跳跃赶上去。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谁也不会想到，左派大理论家陈伯达会在那样一个政治敏感时期提出这样一个背离阶级斗争的新理论！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新理论，在当时自然得不到关注；直到1970年，当他在庐山会以上出事以后，才作为他的错误之一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被批判为“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而这样一个新理论，即使放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都不失其前瞻性。但是，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了它的真理性时，陈伯达却依然是罪犯，他的这一功绩自然也就依然得不到承认。对此，人们不能不为之叹息。

在一般人看来，作为左派大理论家的陈伯达与自然科学是不沾边的，但他的“电子中心论”让我们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而陈晓农的说法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陈伯达：“父亲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但他内心里对自然科学更重视。他年轻时没有学过高等数学，这增加了他学习自然科学的困难，但他有自己的学习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家里一套大部头的《汤姆逊百科全书》和《苏联大百科辞典》，他经常翻阅。他偏爱生物学，认真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环球航行日记》。他仔细阅读科学发展史和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传记，浏览

各种科学杂志，注意物理学、化学和工业新技术的最新进展，经常和一些科学家交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意见。他60年代初提出“电子中心论”，就是在天津和一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进行深入交谈的结果。父亲说：那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说，日本在战后，开始经济很困难，很多人因没有布，连衣服都是穿报纸做的，可后来就是抓了电子技术，经济很快就上去了。日本发展电子技术是由国家立法的。父亲常感叹中国科技的落后，希望国家能吸收各国的好经验，开辟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去。”

陈伯达又一次一反常态固执己见的大胆表现，是他在自己起草的强调生产的九大报告稿被否定以后，针对毛泽东认可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当中央会议上无人提出异议时，却不惧触犯逆鳞，坦陈己见：“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象伯恩施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恼羞成怒地嚷道：“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两人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陈晓农回忆说，“当时，尽管也有人在心里对张、姚的稿子不满，但没有人出来说话。父亲却无所顾忌地对张、姚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击中了张、姚观点的要害，这大大出乎江、康、张、姚等人的意料，他们势必要寻机对父亲进行报复。记得1969年国庆节我回家时，父亲在与我谈话时说道：一个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折才会有用。我现在也还在受挫折。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在鼓励我不要害怕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挫折，没有想到他在中央因在路线问题上反了潮流，而的确正在经受挫折、经受磨折。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现在官方的史书都隐没了。”

陈伯达由于愚忠盲从，步步紧跟而出问题，甚至犯罪的例子也很多，如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发布的关于陈的判决书中所列举的主要罪行，以及1959年高调批判彭德怀，文革初期打倒陶铸，等等，大都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样讲并不是为陈推卸个人应负的责任——“愚忠盲从，步步紧跟”本身就有个人责任。

### 三

陈伯达从1939年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到1970年倒台，时间长达31年。这期间，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秀才班子中，陈一直处在中心地位。陈伯达能够赢得这样的地位，主要靠的是个人的能力和水平。陈20岁时以文言写过一篇题为《原意志》的政论，表现出的天赋和学力即非常人所能及。其文气势磅礴，让人折服：“意志者，吾人人格之表现，精神之所依寄也；正义所在，仅知坚持，不问力之强弱，见识所至，仅知必行，不计事之成败，吾行吾素，于人无与，有史以来，若伯夷宁饿死首阳，而不食周粟，孔孟宁被人目为迂腐，而终说仁义，陶渊明宁赋归去来辞，而不为五斗米折腰，方孝孺宁夷十族，而终不草诏——此其人之举动，不啻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海可枯，而志不可夺，山可移，而志不可变，钱塘江潮，不及其壮，昆仑山峰，不及其高——呜呼，斯真所谓禀天地之正气，不愧为宇宙间之‘伟人’也已！”之后，他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在北平致力于文化工作。在大学当过教授，讲授先秦诸子百家，并发起“新启蒙运动”。1939年到延安，渐渐进入高层视线，并为毛泽东所赏识。

在有毛一代高层秀才中，陈伯达和胡乔木、田家英等基本上处在一个层次上。三人在学养、文化素养、理论水平以及文才方面，虽各有优长，但胡乔木、田家英在个人著述方面却远逊于陈。陈所著长篇政论《窃国大盗袁世凯》、《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都轰动一时，非胡、田所能为之，虽然这些东西皆为宣传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胡、田二人能够进入毛的视野，也是陈的推荐，而且陈为学者出身，所以无论是在党内的地位还是党内的影响力，胡、田二人都应居于陈之下。至于陈、胡、田等之外的邓力群之流，根本就不入流。年轻的一代，像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虽然文笔皆属上乘，但与陈、胡、田等人相比，在学养和全面的文化素养以及才艺方面都差了

一个等级，至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为毛所看重，为江青所依靠，但较之陈伯达这个大秀才，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样一个大理论家大秀才，本来在党内秀才中应当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但事实上，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他却是一个受气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有政治方面的，但陈伯达性格的懦弱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陈晓农回忆说，我母亲（指陈伯达的第二任夫人余文菲）亲口对我说过：“你爸爸是个老实精。”叔宴妈妈（指陈的第三任夫人刘叔宴）也说过：“你爸爸性格太懦弱。”

陈的性格的软弱与他出身的家庭有关。陈伯达说：“有人说我出生于一个号称‘四代书香’的家庭。其实，是一个破落的穷秀才之家。”说陈家“四代书香”，并非虚言。陈的曾祖父陈金城为清朝举人，精于文史哲，与林则徐、陈化成等名人过从甚密；其祖父也是举人，曾为福建惠安县文峰书院山长（院长）。只是到了其父陈其潜时，陈家才败落，一家靠陈其潜当私塾先生维持生计。陈伯达8岁时，父亲去世。陈母为文盲，但生性具有惠安女人的坚忍与倔强，丈夫去世后，独立将子女抚养成人，后因家庭原因上吊自杀。所以陈伯达认为，自己“既有父亲书生懦弱的性格，又有母亲农村妇女的倔强性格”。只是，懦弱老实的一面在陈身上更为突出，特别是经过党性改造“驯服工具”化以后。人善人欺，马善人骑，陈不但老实懦弱，且其貌不扬，拙于言辞，又不善社交，所以在弱肉强食的中国政治生态下被人小瞧就毫不奇怪了。

陈的老实懦弱不但被人看轻，而且压抑和窒息了其思想和学术潜力。以陈的天赋和后天的学养，即使在政治上落败以后，如果能够幡然觉醒，重回“新启蒙运动”，在学术上也会有重大建树。可惜，曾经植入他心灵深处的五四新思想的种子没有复活，所以也就始终没有觉悟。他也认罪，而且诚惶诚恐老老实实地伏罪。不管在法庭上，还是出狱之后，都时刻不忘“我的罪恶是重大的”。但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自己的真正罪恶在哪里，以及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出狱之后也就只能小心翼翼地写出《求知难》、《〈石头记〉里的一桩公案》一类的不咸不淡，没有多少分量的杂感、随笔。胡耀邦在看了陈伯达出狱后写的文稿之后曾经指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写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应当说胡耀邦是了解陈伯达和懂得他的价值的，可惜，陈自己不懂。

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找回自己的灵魂。

□ 原载《共识网》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